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

高句丽遗迹 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魏 存 成

吉 林 大 学
2001 年 2 月

目 录

一、高句丽的起源发展及其遗迹的发现与研究(代前言)	1
(一)、高句丽民族的起源及其活动中心	1
(二)、高句丽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1
(三)、高句丽与中原的关系	5
(四)高句丽遗迹的发现与研究	6
注	10
二、都城	17
(一)、初期都城	17
1. 文献记载中的初期都城	17
2. 五女山城与下古城子古城	18
(二)、中期都城	19
1. 文献记载中的中期都城	19
2. 集安市区平原城与山城子山城	20
3. 中期都城中不同城名的考证	21
4. 东台子等建筑址	27
5. 中期都城通往辽河流域的两条道路与毋丘俭纪功碑	28
(三)、后期都城	32
1. 文献记载中的后期都城	32
2. 大城山城、清岩里土城、安鹤宫与平壤市区内古城	32
(四)、都城的特点与演变	35
注	39
三、山城	42
(一)山城的分布	42
(二)山城的规模	59
(三)山城的类型	61
1. 簸箕型山城	62
2. 山顶型山城	65
3. “筑断为城”型山城	66
4. 左右城与内外城型山城	66
(四)、山城的城墙、设施与建筑	67
1. 城墙结构及有关设施	68
2. 城内外设施与建筑	70

(五)、山城与平原城相结合·····	72
1. 虎山山城与濛河尖古城·····	73
2. 长寿山城及其南侧都市遗迹·····	74
(六)、高句丽晚期长城·····	75
注·····	78
四、墓葬·····	85
(一)、积石墓·····	85
1. 积石墓的类型·····	86
2. 不同类型的等级与年代·····	90
(二)、集安大型积石墓王陵与好太王碑·····	94
1. 集安大型积石墓·····	94
2. 集安高句丽王陵的分布·····	95
3. 太王陵、将军坟墓主推断·····	98
4. 好太王碑·····	100
(三)、集安、桓仁壁画墓·····	105
1. 墓葬的形制结构与壁画的内容布局·····	105
2. 壁画墓的分期与年代·····	112
(四)、朝鲜境内壁画墓·····	114
1. 壁画墓的分布、形制结构与壁画的内容布局·····	114
2. 壁画墓的分期与年代·····	117
(五)、墓葬的类型演变与葬俗·····	119
1. 墓葬的类型演变·····	119
2. 墓葬的分布排列·····	120
3. 有关合葬、火葬、葬具、二次葬与墓上碑刻、建筑等迹象·····	122
(六)、重要随葬品·····	125
1. 陶瓷器·····	125
2. 金属器·····	126
注·····	130
后 记	

一、高句丽的起源发展及其遗迹的发现与研究（代前言）

（一）、高句丽民族的起源及其活动中心

高句丽是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起码在西汉中期的历史事件中已有明确记载。汉武帝灭卫氏朝鲜，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其中玄菟、乐浪所属居民，《汉书·地理志》记“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①。玄菟郡设有高句丽县，应劭为其作注曰：“故句骊胡。”至《后汉书·高句丽传》则将此事连续记下来：“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以上所记“句骊”、“高句骊”，当然不是后来的高句丽政权，而是指高句丽民族。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玄菟郡所辖除高句丽县之外，还有上殷台、西盖马二县，而首县是高句丽县。照惯例，首县即郡治所在，其实玄菟郡郡治开初并非在高句丽县，而是在沃沮城，西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玄菟郡郡治从沃沮城迁到高句丽县，见《三国志·东沃沮传》和《后汉书·濊传》^②。沃沮城的地点，现学术界多考证为朝鲜东北部之咸镜南道咸兴^③。高句丽县的地点在哪里呢？《三国志·东沃沮传》记为“句丽西北”，《后汉书·东沃沮传》记为“高句骊西北”，这里所说的“句丽”、“高句骊”同样是指高句丽族而言。结合近年考古发现，高句丽县被确定于辽宁省新宾县境内^④。当时这里同样有高句丽族居住，但是高句丽族的活动中心并非在此，而是在其东南、即今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的辽宁省桓仁及吉林省集安地区。

（二）、高句丽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高句丽政权始建于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据其创始传说，它并非是由原居住在桓仁、集安一带的高句丽族所建，而是由北夫余族的王子朱蒙来建立的。高句丽和夫余属于同一种族的濊貉族系，而且在政权创始中具有很相似的传说。

高句丽政权的创始传说，首见于414年的好太王碑，之后又见于冉牟冢题记，但都是寥寥几句。成书于554年的《魏书》，则记载得相当详细，达300多字。几百年之后，1145年高丽作家金富轼撰《三国史记》，又增加了不少细节，其中高句丽政权创建的具体时间，也首见于此书。尽管如此，其基本内容仍可看出是抄自《魏书》^⑤。

夫余政权的创始传说先后见于《论衡》和《魏略》。《论衡》是王充晚年的著作，王充在世时间为公元27—约96年。《魏略》稍晚，作者鱼豢是三国时期的人物。两书都明显早于上述《好太王碑》、《魏书》等碑刻文献。因此可以认为，作为传说，是高句丽借用了夫余的传说。对此，唐代初年修著的《梁书》曾指出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⑥。

依《魏书》和《三国史记》，朱蒙率人自夫余南下，沿途又收纳贤人，至沸流水，降服了该水上游“累世为王”的沸流国，方得立稳脚跟，向外发展。此沸流国有可能就是

《后汉书》、《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所记的消（涓）奴部，而建立高句丽政权的朱蒙部当属桂娄部^①。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已有高句丽县之建置，所以高句丽政权的名称应是直接从高句丽县而来。

高句丽政权自公元前 37 年创始，至 668 年灭于唐，共经 700 余年，传 28 王，其位序见如下表一：

表一

位序	王号	名	在位时间	备 注
1. 东明圣王 2. 琉璃明王 3. 大武神王 4. 闵中王 5. 慕本王 6. 太祖大王 7. 次大王 8. 新大王 9. 故国川王 10. 山上王 11. 东川王 12. 中川王 13. 西川王 14. 烽上王 15. 美川王	1. 东明圣王 邹牟王（好太王碑文）	朱蒙 邹牟 众解	37～19	本表太祖大王至新大王世系采用顾颉学之考证 ^② ，《三国志》载太祖大王至新大王世系为： 再 4. 3. 恩 闵 大 中 武 神 王 8. 7. 6. 5. 新 次 太 慕 大 大 祖 本 王 王 大 王 王 10. 发 9. 须 山 岐 故 国 川 王 《三国志》误记故国川王又名伊夷模，此改正。 《三国志》误记山上王又名位宫，此改正。
	2. 琉璃（琉）璃明王 儒留王 儒留王（好太王碑文）	姜利 儒留	19～18	
	3. 大武神王 大解朱留王 大朱留王（好太王碑文）	无恤	18～44	
	4. 闵中王	解色朱	44～48	
	5. 慕本王	解忧 解爱姜	48～53	
	6. 太祖大王 国祖王	宫 於那	53～146	
	7. 次大王	遂成	146～165	
	8. 新大王	伯固 伯句	165～179	
	9. 故国川王 国襄（壤）王	男武	179～197	
	10. 山上王	延优 伊夷模	197～227	
	11. 东川王 东襄（壤）王	优位居 郊夷位宫	227～248	
	12. 中川王 中壤王	然弗	248～270	
	13. 西川王 西壤王	药卢 若友	270～292	
	14. 烽上王 雉焉王	相夫 猷夫姜	292～300	
	15. 美川王 好壤王	乙弗 忧弗	300～331	

13. 西川王 14. 煬上王 15. 美川王 16. 故国原王 17. 小鲁林王 18. 主国壤王 19. 广开土王 20. 长寿王 21. 文咨王 22. 安藏王 23. 安原王 24. 阳原王 25. 平原王 26. 荣留王 27. 荣留王 28. □□王藏	16. 故国原王 国冈上王	斯由判	331~371	《三国史记》记故国壤王逝世、广开土王继位是 392 年，而据《好太王碑》碑文和德兴里壁画墓题记，广开土王元年为 391 年，依此改正。 据《好太王碑》纪年，广开土王在位 22 年，应到 412 年。《三国史记》记当年长寿王继位，而元年之记事——“遣长史高箕入晋奉表献赭白马，安帝封王高句丽王乐安郡公”，查《晋书》、《通鉴》412 年并无此事，只有《晋书》安帝义熙九年（413）记“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故此定广开土王 412 年去世，长寿王当年即位，但元年自 413 年开始。 又，《三国史记》记长寿王于 491 年冬十二月去世，文咨明王继位，但又记其元年春魏孝文帝册封之事，而此事，《魏书》、《通鉴》都记在 492 年，故文咨明王元年应为 492 年。 《三国史记》：“王讳臧（或云宝臧），以失国故无谥。”
	17. 小鲁林王 小解朱留王	丘夫	371~384	
	18. 故国壤王	伊连 於只支	384~391	
	19. 广开土王 国冈上广开土 境平安好太王 (好太王碑文) 国冈上广开土 地好太王(壶杆刻 铭) 永乐大王 (好太王碑文)	谈德	391~412	
	20. 长寿王 康王(《魏书》)	巨连 瑱	413~491	
	21. 文咨王 文咨明王 明治好王	罗云 云(《魏 书》)	492~519	
	22. 安藏王	兴安	519~531	
	23. 安原王	宝延	531~545	
	24. 阳原王 阳岗上好王	平成	545~559	
	25. 平原王 平岗上好王	阳成 汤	559~590	
	26. 晏阳王 平阳王	元 大元	590~618	
	27. 荣留王	建武 成	618~642	
	28. □□王	藏 宝藏	642~668	

高句丽，后改称高丽，对此最早自金毓黻开始，近年李殿福、孙进已先后撰文讨论，分别提出569年、520年、423年不同的时间^⑨。我在编写《高句丽考古》时推定为六世纪初^⑩，比520年早10余年，根据是《梁书》和《魏书》的记载。《梁书·高句丽传》记：“天监七年（508年），诏曰‘高丽王乐浪郡公云，乃诚款著，贡驿相寻，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王并如故。’”《魏书·高句丽传》记：“正始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悉弗进曰：‘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赋是为。’世宗曰：‘高丽世荷上将，专制海外，九夷黠虏，实得征之。瓶罄罍耻，谁之咎也？昔方贡之愆，责在连率。卿宜朕旨于卿主，务尽威怀之略，搆拔害群，辑宁东裔，使二邑还复旧墟，土毛无失常贡也。’”正始中，即504—508年，与上述《梁书》记载的时间不约而同。孙进已提出423年，根据是《宋书·少帝纪》中景平元年（423年）三月“高丽国遣使朝贡”之记载。其实此不好定为当时的称谓，而应用《宋书》编著时的称谓对以往事件的记述。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宋书·出版说明》介绍，《宋书》纪传部分完成的时间是488年，同时还说《宋书》在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宋书》卷四少帝纪有缺页，为后人所补。大家知道，唐初修著的《南史》、《北史》是删节《宋书》等八书、并补充了一些史料而成，《宋书》散失的部分又可以由《南史》补上。经查，《南史》中出现“高丽”名称的记事与《宋书》相同，当然这不能和《南史》成书的时间相连系，而说明“高丽”名称的出现与《宋书》成书的时间还是贴近的。另外，孙进已还引用了《魏书·礼志》中的一段记载，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高丽王死，十二月诏曰：‘高丽王琽守番东隅，累朝贡职，年逾期颐，勤德弥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将为之举哀……’”尽管在《魏书·高句丽传》的记载中，魏孝文帝仍策赠琽为高句丽王，同时拜琽孙云继位为高句丽王，但是《魏书·礼志》所记毕竟是最早出现“高丽”名称的诏书，不可忽视。还有，被认定为立于文宣王四年（495年）的“中原郡碑”（彩版十），碑文中也出现了“高丽大王”的名称，其年代也是与此相符的^⑪。所以高句丽改称高丽的时间，应从六世纪初再提早到五世纪末。

关于“丽”和“骊”字，上引《梁书·高句丽传》中记为“高骊”，而《梁书·武帝纪》记，天监七年二月“乙亥，以车骑大将军高丽王高云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再如《三国志》，《丘俭传》和《三少帝纪》记毋丘俭讨伐高句丽之事，皆记的是“高句骊”，而《高句丽传》记为“高句丽”。可见“丽”和“骊”二字是通用的。为了行文统一，本书除引文中原名、原字不变外，其他一律使用“高句丽”三字之名称和文字。

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其势力限于浑江流域。东汉时期高句丽发展较快。《后汉书·高句丽传》记：“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涉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则是以桓仁、集安、通化地区为中心，西边占据了新宾一带，北到辉发河流域和第二松花江上游，与夫余相接，东至延边，南至清川

江,与乐浪为邻。汉末三国时期,由于公孙氏和魏将毋丘俭先后征伐,高句丽西进受挫。四世纪初,高句丽占领乐浪、带方,其势力向南发展到了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开始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相争雄。四世纪中叶,慕容鱿又一次远征高句丽,“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⁴⁵。但是中原战乱不止,高句丽西邻的慕容鲜卑势力日趋衰落,于是到五世纪初,辽东之地终被高句丽占有。与此同时,高句丽向北发展,410年其势力到达吉林市之夫余故地⁴⁶,便和后来从松花江下游南下的勿吉族相接壤。之后,高句丽又把南面作为主要发展方向,475年长寿王率兵攻破百济都城汉城,迫使百济迁都熊津(今公州),高句丽的势力到达汉江流域。至此,高句丽政权的区域范围达到了极限。六世纪末,中原南北统一,国力大增,645年唐兵渡过辽水,收回辽东,又经20多年,至668年,唐兵攻克平壤,在历史上持续了700年之久的高句丽政权灭亡。

(三)、高句丽与中原的关系

高句丽在其存在的各个时期,尽管与中原发生了数次战争,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多方面的联系。

其实,早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中原的势力和文化已延伸到了高句丽的活动地区。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燕昭王派大将秦开却东胡,扩边到朝鲜半岛的西北部⁴⁷,近年在大宁江沿岸已发现了燕国长城⁴⁸。另外在桓仁、集安以及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等广大地区,先后发现了大批燕秦汉货币和燕国系统的铁器。货币有“明刀”、“半两”、“五铢”、“货泉”等,铁器有生产工具犁、锄、铍、镰、半月形双孔掐刀、凿和兵器矛、镞等,其中有的遗址中货币和铁器共出⁴⁹。1980年在集安还发现了刻有铭文的赵国青铜短剑,1991年在长白县又发现了赵国蔺相如铜戈⁵⁰。

汉四郡建立后,高句丽属玄菟郡管辖,《三国志·高句丽传》记:“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渌。沟渌者,句丽名城也。”这里所说的“后稍骄恣”,应是指政权建立之后而言。而就是在此时,高句丽仍然接受中原“朝服衣帻”之非同一般有馈赠,只是在形式上不像过去那样直接到玄菟郡去领取。

高句丽建立政权,自称为王。王莽执政时期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高压政策,并强迫调发高句丽兵伐胡,高句丽兵“皆亡出塞”,王莽“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⁵¹,于是高句丽人反抗愈甚。东汉建立,高句丽遣使朝贡,光武帝则复其王号。以后这种册封关系便一直继续下去。四世纪初,高句丽占领乐浪后,前燕则封故国原王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⁵²。五世纪初,高句丽占领辽东后,北魏政权又封长寿王琄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⁵³。当时,高句丽使者到北朝受到的礼遇,仅次于南朝使者,因而引起南朝使者的不满⁵⁴。与此同时,高句丽也接受南朝的册封。据文献记载,在这期间高句丽派使者去十六国12次、北魏79次、东魏15次、北齐6次、北周1次,计113次;派使者去东晋3次、宋22次、南齐5次、梁11次、陈6次,计47次,南北合计160次⁵⁵。进入隋唐,

双方战争的规模在升级，但是隋唐中央政权对高句丽的册封仍未中断。

据不同记载，集安曾出铜印“晋高句骊率善仟长”一方，“晋高句骊率善佰长”二方和“晋高句骊率善邑长”一方。其中最后一方现藏故宫博物院，高不盈寸，兽纽，印模2.2厘米见方，厚可0.7厘米，白文篆书^⑧（图1）。此发现不仅说明高句丽设有仟长、佰长、邑长基层建置，而且说明中原政权对高句丽的政治影响并非只限于高句丽上层。

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其范围更为广泛。迄今在高句丽墓葬中出土的黄河、长江流域制造的铜器、青瓷器、鎏金带具带饰即是明显的例证之一。据文献记载，公元372年高句丽“立太学，教育子弟”^⑨，其“读书习射”的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旧唐书·高丽传》记：“（高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扁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高句丽原祭祀的是隧神，《三国志·高句丽传》说：“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座。”祭祀隧神的习俗一直到高句丽后期仍在流行。但是，也是在372年，又从中原传入了佛教。这一年，“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375年高句丽建肖门寺，392年故国壤王“下教崇信佛法求福”，第二年“创九寺于平壤”^⑩，于是佛教在高句丽迅速传播开来。道教传入高句丽是在唐初，这大概也与道教在唐王朝的地位升高有关。《旧唐书·高丽传》记，624年唐“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第二年，荣留王建武“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教法，帝许之”^⑪。643年，应宝藏王之请，唐太宗又“遣道士叔道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⑫。因此，在高句丽晚期，道教的发展还是很快的。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在吸收中原文化的过程中，高句丽占领平壤和辽东，具有重要的意义。平壤之地，自汉设乐浪郡始已有400年之久。迄今这里还保留着乐浪郡治土城、洞土城和数以千计的封土木椁墓、砖室墓，出土过大量的带有汉字铭文的纪年遗物和其他遗物。而辽东，自战国燕设郡开始，这里一直是中原政权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因此，高句丽占领平壤和辽东，不仅对其势力的发展、政权的巩固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其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高句丽遗迹的发现与研究

高句丽遗迹分布在我国吉林省、辽宁省的东半部和朝鲜半岛的北半部。高句丽遗迹的发现，以好太王碑为最早，时间在清朝末年。根据碑文拓片，我国的一些官吏和金石学者便开始进行研究，有的还作了实地考察。

好太王碑发现后，日本人利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对好太王碑研究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其他高句丽遗迹的调查研究。首先来集安正式调查的是鸟居龙藏，时间在1909年，他的报告单独作为一章收录在第二年出版的《南满洲调查报告》中。1913年，关野贞同今西龙、谷井济等人调查了平壤、集安两地的高句丽遗迹，第二年在《考古

学杂志》第五卷第3号、第4号上发表了《满洲辑安县及平壤附近的高句丽时代遗迹》。1917年,关野贞又调查了朝鲜云山、渭原、楚山和集安榆树林子高句丽墓葬,他的调查报告被收录在《大正六年度古迹调查报告》之中。1935年,池内宏、梅原末治、三上次男等人对集安高句丽墓葬和城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第二年出版了大型重要报告《通沟》。1935年到集安调查的还有三宅俊成、伊藤伊八等人。1937年,黑田源次调查了通沟12号和五盔5号壁画墓。集安之外,吉林市和抚顺市也是调查了重要地点,当时中国学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李文信20年代利用在吉林市工作的机会,放弃假日休息,不辞劳苦,业余调查了龙潭山及其周围的史迹,并于1937年、1938年在《满洲史学》上连续发表了《吉林龙潭山遗迹调查》。之后,1940年藤田亮策又去龙潭山进行了调查。首先对抚顺高尔山城进行调查,并认定该城为高句丽新城的是当时的日伪抚顺博物馆馆长渡边三三,时间在1933年;第二年我国东北史研究前辈金毓黻又去作了踏勘和确认;1940年、1944年三上次男进行了调查、发掘,至1984年、1993年田村晃一两次走访高尔山城,然后根据三上次男当年的记录和本人的研究,编写出版了《北关山城》^②。

二次大战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其境内的高句丽遗迹先后进行了一些发掘,如:1949年发掘了具有明确纪年和身份的安岳3号冬寿墓,墓中除题记外,还有精美的壁画;从50年代开始连续多次大面积地调查、发掘了大城山城和安鹤宫遗址;1974年发掘了认为其中之一是“东明王陵”(封土石室壁画墓)的真坡里古墓群;1976年发掘了又一座具有明确纪年和身份的德兴里壁画墓;在调查、发掘和编写报告的同时,还先后出版了一些综合研究著作,如《高句丽的壁画古坟》(朱荣宪著)、《高句丽文化》和《朝鲜考古学概要》(朝鲜社科院考古所著)等^③。

二次大战后,日本学者对高句丽的考古研究,主要是利用原有材料和中国、朝鲜新发现的材料而进行的,其中专题研究比较多,有的也相当仔细、深入。东潮、田中俊明编著、1995年4月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高句丽的历史和遗迹》,则是日本第一部全面系统的高句丽考古著作。

对于我国境内的高句丽遗迹进行大量而有计划的保护和调查、发掘、研究,还是解放后由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逐步实现的。迄今,多处重要的高句丽遗迹、遗物已先后被列为国家、省、市、地、县级重要文物保护单位,而且通过各地的调查、发掘,使我们对高句丽文化的认识也逐步丰富和加深起来。

辽宁省在50年代末配合水库工程对桓仁县高力墓子村积石墓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高句丽早期墓葬的宝贵材料^④。继以往调查之后,1983年起连续三年对抚顺高尔山城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了重要的高句丽建筑遗迹和丰富的陶器、铁器。与此同时,辽宁省还先后调查了沈阳石台子山城、西丰城子山山城、凤城凤凰山山城、海城英城子山城,以及大连、岫岩、丹东、铁岭、新宾、开原等地的多处山城,其中对石台子山城于1990年、1991年小范围试掘之后,1997年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清理和重点发掘^⑤。1991

年发掘了雅河乡米仓沟“将军坟”，这是在桓仁县发掘的第一座封土石室壁画墓^④。1994年对高丽（力）墓子村所余积石墓又进行了正式发掘，其结果再次证明该墓地的时代为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⑤。

吉林省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集安。1958年对东台子建筑遗址进行发掘，使我们对高句丽高等级建筑的结构和瓦件有了较清楚的认识^⑥，同时对好太王碑、站前石柱和丸都山城、国内城进行了调查、实测，在梨树园子南遗址发现了珍贵的白玉耳杯（黑白图版四）。1960年、1962年先后两次由通化地区和集安县组成文物普查队，对全县文物进行了普查，其中包括高句丽南、北道上的几处重要的关隘和城堡，同时还清理了五盔4号、5号和通沟12号壁画墓。其中五盔4号墓的壁画保存得相当完整，色彩也非常鲜明艳丽^⑦。1963年发掘了麻线沟1号壁画墓^⑧。1968年和1970年，两年集中发掘了700多座墓葬，其中包括重要的长川一号壁画墓，壁画中伎乐百戏、山林逐猎场面和拜佛图堪称诸墓壁画之佳作^⑨。1972年发掘了长川2号壁画墓^⑩。1974年发掘了禹山下41号方坛阶梯石室壁画墓^⑪。1975年发掘了七星山1196号和万宝汀242号积石墓^⑫。从1975年开始，对国内城城墙连续进行了解剖，获得了国内城建筑年代和建筑结构的重要资料^⑬。1976年配合农田建设，集中清理了100多座中小型墓葬^⑭。80年代中叶，为了配合集锡公路建设（集安—锡林浩特），于禹山墓区之铁路北侧发掘了100余座墓葬，在墓葬形制结构和随葬品方面都有重要的发现^⑮。1990年对太王陵墓室进行清理，发现了原意料不到的石椁，现已作了复原。集安之外，对于吉林、延边、柳河、辽源等地的高句丽山城，在这期间也先后进行了调查。

伴随上述调查、发掘，对于高句丽遗存的研究也同时开展起来，其中主要集中于都城、山城、墓葬和重要遗物几方面。

研究高句丽都城，包括对都城中某一城址的考察和都城全貌的综合分析。前者如《高句丽丸都山城》^⑯；后者有《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高句丽的都城》、《高句丽的都城与疆域》、《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都城》等^⑰。高句丽都城的重要特点是山城和平原城相结合，如集安山城子山城与市区平原城、平壤大城山城与清岩里土城或安鹤宫，而《高句丽、渤海文化之发展及其关系》在谈到高句丽后期都城中的长安城时，首次提出了该城的规划布局接受了中原北魏洛阳城的影响。与都城有关，《集安东台子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一文提出了位于国内城东侧的东台子建筑址很可能是四世纪末高句丽王兴建的王室社稷和宗庙的新见解^⑱。

高句丽城址中最常见的山城，随着调查工作的展开，近年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之一。先后发表的文章有《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辽宁境内高句丽山城的考察》、《鸭绿江右岸高句丽山城研究》、《辽宁高句丽山城再探》、《吉林省高句丽山城的现况和特征》等^⑲。与山城有关，对通往高句丽中期都城的南、北道和高句丽晚期的西部千里长城也进行了探讨^⑳。

高句丽墓葬分布广、数量大，其类型大体分为积石墓和封土墓两大类。积石墓的时

代早,主要分布在我国境内,以集安最为集中。对于积石墓的研究,先后有《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试论桓仁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年代及其演变》、《高句丽石墓的演进》、《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演变》、《高句丽串墓的考察与研究》等文章^⑤。同时,在有的墓葬发掘报告中也对墓葬的类型进行了论述。通过以上研究,大家逐步认识到,高句丽积石墓的外部结构无坛、方坛和方坛阶梯,代表的主要是墓葬的等级高低,而积石墓的内部结构石圪和石室,代表的则是墓葬的时代先后。其中对于属于王陵级的大型积石墓,又有《千秋墓、太王陵和将军坟墓主人的推定》、《集安高句丽大型积石墓王陵》等文章对其时代先后和墓主人进行了讨论^⑥。

高句丽封土墓的时代晚于积石墓,其数量并不比积石墓少,而且在我国境内和朝鲜皆有大量分布。但是以往的发现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有壁画的大中型墓(高句丽壁画墓绝大部分为封土墓,个别为积石墓)。朝鲜黄海南道具有永和十三年(357年)题记的安岳3号壁画墓发现不久,宿白先生即撰文对其墓主人冬寿进行了考证^⑦。平安南道辽东城冢发掘之后,俞伟超先生也撰文进行了考证^⑧。对于高句丽壁画墓首先进行综合研究的,是杨泓先生发表的《高句丽壁画石墓》和1974年宿白先生编著的《三国——宋元考古》(上)^⑨,接着吉林省和辽宁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相继从不同角度撰文进行了讨论,其中心问题仍是通过墓葬形制结构和壁画内容、布局的分析,去探讨壁画墓的年代、分期,以及高句丽社会生活的特点和变化。

对于高句丽重要文物的研究,好太王碑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的关注点。从1981年开始,王健群、方起东对好太王碑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刘永智、王仲殊、耿铁华、徐建新等也先后发表论著,把好太王碑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⑩。陶器是高句丽遗物中最常见的,80年代对陶器综合分期和典型器物四耳展沿壶的研究开始起步^⑪。建筑瓦件中进行研究的是瓦当^⑫。金属器中常见的是兵器和马具,研究的文章也比较多。在研究马具的同时,还涉及到了当时中外文化的交流,通过排比得知,当时高句丽马具的发展受到了鲜卑的影响,之后,这种影响通过高句丽又传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⑬。

在以上调查、发掘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对于高句丽考古的综合研究工作也开展起来。1974年宿白先生编著的《三国——宋元考古》(上),高句丽遗迹是作为单独一章列了进去。李殿福、孙玉良合著的《高句丽简史》,书中引用了大量考古材料^⑭。吉林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高句丽考古》;1997年出版的《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考古编八章中有一章是高句丽考古的内容^⑮。另,王禹浪、王宏北编著的《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是目前收集高句丽城址最多的著作^⑯。

注

①本书所引二十四史，皆用中华书局校点本。

②《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东沃沮传》：“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浞传》：“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

③④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19—20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⑤《好太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女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车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女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本书所引好太王碑碑文，均引自方起东：《〈好太王碑碑文〉释读》，见中国著名碑帖选集27《好太王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

《魏书》卷一百《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弩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年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一云邹牟、一云众解）。先是扶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乘御马至蜺渊，见大石相对流泪。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蛙一作蜃）。王喜曰：‘此乃天贶我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乃解夫娄薨，金蛙嗣位。于是时，得女子于太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

为日所烁，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烁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王弃之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于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嶷然异常，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扶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金蛙有七子，常与朱蒙游戏，其技能皆不及朱蒙。其长子带素言于王曰：‘朱蒙非人所生，其为人也勇，若不早图，恐有后患，请除之。’王不听，使之养马。朱蒙知其骏者，而减食令其瘦，驾者善养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者给朱蒙。后猎于野，以朱蒙善射，与其矢少，而朱蒙殪兽甚多。王子及诸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之，告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而不可？与其迟留而受辱，不若远适以有为。’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流水（一名盖斯水，在今鸭绿东北），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普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纳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纳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魏书云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遽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一云朱蒙至卒本扶余，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时朱蒙年二十二岁，是汉孝元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甲申岁也。”

⑥《论衡·吉验篇》：“北夷鬻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圈中，猪以气嘘之，不死。复徙之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羊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淹流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引自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1995年第2次印刷。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夫余传》注引《魏略》：“旧志又言，昔北方有高离之国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曰：‘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后生子，王捐之于圈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闲，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度（渡），鱼鳖乃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余之地。”

《梁书》卷五十四《东夷·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其先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鬻离王之子。离王出行，其侍儿于后任娠，离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遂后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王以为神，乃听收养。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流水，以弓击

水，鱼鳖皆浮为桥，东明乘之得渡，至夫余而王焉。其后支别为句骊种也。”

⑦《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高句骊传》：“（高句骊）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高句丽传》：“（高句丽）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

⑧顾铭学：《魏志高句丽传解说》，《学习研究丛刊》1981年第2期。

⑨金毓黻：《东北通史》第176页，吉林省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业经省出版局（80）吉业印字第205号文批准，下同；李殿福：《高句骊金铜、石雕佛造像及中原郡碑——兼谈高句骊易名高丽之始》，《博物馆研究》1991年第1期，《考古》1993年第8期，该文考证易名的时间为520年，而且从这一年始，“骊”字改为丽”。

孙进已：《东北民族史研究》（一），第273—27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199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⑩魏存成：《高句丽考古》第4—5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

⑪中原郡碑是1979年在韩国忠清北道中原郡金简（可全面）龙田里立石村村口发现的。碑用自然石略加修琢而成，呈长方形，通高1.44米，地上高度为1.35米，宽0.49（0.55）—0.55（0.59）米，厚0.37—0.38米。碑文隶书，四面环刻，残蚀甚重，正面（东面）竖向10行，每行23，左侧面7行，每行23字（见本注后），其余两面，难于辨识。在正面碑文上方还横书“建兴四（年）”几字。碑文中的“祖王”和“高丽大王”，有的学者认为是长寿王和文咨王，该碑立于文咨王四年（495年），碑文主要记载的是475年高句丽攻破百济首都汉城后与新罗交往的事项；有的认为是安原王和平原王，该碑立于平原王晚年。参见李殿福：《高句骊金铜、石雕佛造像及中原郡碑——兼谈高句骊易名高丽之始》，《博物馆研究》1991年第1期，《考古》1993年第8期；徐光辉：《中原高句丽碑》，《东北亚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1年。

⑫《晋书》卷一百九·载记第九《慕容皝传》。

⑬《好太王碑》：“（好太王）廿年（410年）庚戌，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举国骇服。”

⑭《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曰：“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民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金毓黻考证，以上二事“皆以秦开为主，其破东胡，攻朝鲜，自系一时之事，盖是时之东胡，在燕之北，朝鲜在燕之东”，秦开开辟辽东的时间，“于周赧王十五年，为燕昭王十二年”，即前300年，见《东北通史》第58—60页。

⑮孙永钟著、顾禹宁译：《关于大宁江畔的古长城》，《博物馆研究》1990年第1期；李健才：《关于朝鲜“大宁江长城”建筑年代问题的探讨》，《博物馆研究》1996年第3期；郑君雷：《大宁江长城的相关问题》，《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

⑯李莲：《辑安发现古钱》，《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古兵：《吉林辑安历年出土的古代钱币》，《考古》1964年第2期；王巍：《中国古代铁器及冶铁技术对朝鲜半岛的传播》，《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⑰集安县文物保管所：《吉林集安发现战国青铜短剑》，《考古》1982年第6期；黄盛璋：《跋集安新出阳安君剑》，《考古》1983年第5期；赵书勤：《集安两件馆文物名称小考》，《博物馆研究》1997年第2期；长白县文管所：《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发现高句丽铜戈》，《文物》1998年第5期。

⑱《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高句丽传》。

⑲《晋书》卷一百十·载记第十《慕容皝传》。

⑳《魏书》卷一百《高句丽传》。

㉑《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夷·高丽传》：“虏（北魏）置诸国使邸，齐使第一，高丽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参军颜幼明、冗从仆射刘思敬使虏。虏元会，与高丽相次。……幼明又谓虏主曰：‘二国相亚，唯齐与魏。边境小狄，敢蹶臣踪。’”

㉒韩昇：《四至六世纪百济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韩国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第7回国际学术会议·百济社会诸问题》，1994年。

㉓翟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卷十二录三方晋高句丽官印：“晋高句丽率善佰长”、“晋高句丽率善佰长”、“晋高句丽率善邑长”，其中最后一方收入1982年罗福颐主编的《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知其现藏故宫博物院，金毓黻《东北通史》第177页：“近岁在辽宁省辑安县九都故址，发现古印一方，文曰‘晋高句丽率善佰长’，铜质白文。”另参考张英、任万举、罗显清：《吉林出土古代官印》，文物出版社1992年；华岩、杰勇：《吉林集安出土的几方铜印》，《北方文物》1985年第4期。

㉔㉕《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

㉖《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八。

㉗《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九。

㉘《东北通史》第222页；三上次男：《高句丽と渤海》第85—100页《抚顺北关山城》，吉川弘文馆，平成二年（1990年）；金花顺：《抚顺高尔山城四十年代的考古工作——日本〈北关山城〉简介》，《博物馆研究》1997年第2期。

㉙朱荣宪著、有光教一监修、永岛晖臣慎译：《高句丽的壁画古坟》，学生社，昭和47年；朝鲜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吕南喆、金洪圭译：《高句丽的文化》，株式会社同朋舍出版，昭和57年；朝鲜社科院考古所编，李云铎译、顾铭学、方起东校：《朝鲜考古学概要》，黑龙江文物出版编辑室（内部发行），1983年。

㉚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⑪有关辽宁省高句丽山城的发现,见本书三:表四。

⑫辛占山:《桓仁米仓沟高句丽“将军墓”》,《东北亚考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⑬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馆、桓仁县文物管理所:《辽宁桓仁县高丽墓子离句丽积石墓》,《考古》1998年第3期。

⑭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考古》1961年第1期。

⑮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辑安县文物管理所:《吉林辑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1964年第2期;方起东:《吉林辑安高句丽霸王朝山城》,曹正裕、朱涵康:《吉林辑安榆林河流域高句丽古墓调查》,《考古》1962年第11期;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王承礼、韩叙华:《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考古》1964年第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⑯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字麻线沟一号壁画墓》,《考古》1964年第10期。

⑰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⑱陈相伟:《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简记》,《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⑲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第2期。

⑳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集安文物保管所:《集安万宝汀242号古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㉑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第1期。

㉒柳岚、张雪岩:《1976年集安洞沟古墓清理》,《考古》1984年第1期。

㉓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文物保管所:《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墓葬发掘》,《高句丽研究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

㉔李殿福:《高句丽九都山城》,《文物》1982年第6期。

㉕魏存成:《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李殿福、孙玉良:《高句丽的都城》,《博物馆研究》1990年第1期;李健才:《高句丽的都城与疆域》,《东北史地考略》(续集),文物出版社,1995年;王绵厚:《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都城》,《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㉖魏存成:《高句丽、渤海文化之发展及其关系》,《吉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方起东:《集安东台子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㉗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辛占山:《辽宁境内高句丽山城的考察》,王绵厚:《鸭绿江右岸高句丽山城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再探》,《北方文物》